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2024年6月18日至7月12日

议程项目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以超越增长的方式消除贫困

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奥利维耶·德许特的报告

概要

消除贫困的主要办法是增加(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总产出，同时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进行市场分配后的再分配。但特别报告员认为，目前把重点放在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上是错误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并不是实现人权或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的先决条件。我们迫切需要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来提高人们的福祉，同时减少生产不必要甚至有害的产品和服务，这一必要性不能因“增长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有所偏离。一旦将利润最大化作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经济就会呼应社会最富有群体的需求，导致榨取性生产方式，以创造更多财富的名义加剧社会排斥，也就无法实现贫困人口的权利。从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驱动的经济转向人权经济是可能的，并且就不超出地球极限的目的而言也是必要的。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阐述为何这种转变是必要的以及转变的可能方式。



一. 导言

1. 经济增长被定义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长期以来，经济增长本身一直被视为是值得期待的。经济学家讨论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政治家则讨论如何分享经济增长的惠益。人权机构将增长视为实现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不可或缺条件，这一观点基于如下假定：如果没有增长，就没有资源可用于逐步实现经济和社会权利——无法投资于提供卫生保健、社会住房或教育，或创造就业机会。¹ 各国政府仍然以“无限增长是可能的”这一理念行事。政府无视科学家的警告，² 似乎笃信经济活动可以无休止地扩张，仿佛地球能够永远提供无限的资源并消化因我们明显无休止的“追求更多”的行为而产生的废物。

2. 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对上述假定提出质疑。首先，他认为增长会分散人们对消除贫困和实现所有人的福祉这些真正重要问题的关注。³ 第二，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远远超出了实现人民繁荣所需的水平，变得臃肿。在这些国家，增长未能减少贫困和不平等，也未能创造就业。这种状况正在导致一些地球极限被突破。⁴ 第三，在依靠外债束缚维持的后殖民统治模式下，全球南方的资源遭到掠夺，从而助长了这一趋势。⁵ 贫困国家仍然需要大量投资用于建设学校和医院、交通或电力基础设施，在这些国家增长仍然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然而，在实践中，增长往往是榨取性的，依赖于剥削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不可持续开采。因此，如果要推动实现人权，就必须改变增长的方向。应重新定位增长，使其以满足需求和更广泛的成果分享为目标，而不是仅仅让富人更富和加强主要经济行为体的支配地位。⁶

3. 尽管有其局限性，但增长已占据主导地位。⁷ 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是衡量政府业绩的主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既被视为大规模再分配的替代办法，也被视为应对社会面临的某些挑战的先决条件。毫不意外，贸易自由化正是以增长的名义推行的：《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提及，需要确保“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大量稳步增长，并[扩大]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贸易”（序言部分第一段）。另一

¹ Matthias Petel and Norman Vander Putte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nd their dependence on the economic growth paradigm: evidence from the ICESCR system”, *Netherlands Quarterly of Human Rights*, vol. 39, No. 1 (2021), pp. 53–72.

² William J. Ripple and others, “World scientists’ warning of a climate emergency”, *BioScience*, vol. 70, No. 1 (2020), pp. 8–12.

³ Kate Raworth, *Doughnut Economics: Seven Ways to Think Like a 21st-Century Economist* (London, Random House Business, 2017); and Jason Hickel, *Less is More: How Degrowth Will Save the World* (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2020).

⁴ Johan Rockström and others, “Safe and just Earth system boundaries”, *Nature*, vol. 619, No. 7968 (2023), pp. 102–111.

⁵ Jason Hickel, “Is it possible to achieve a good life for all within planetary boundarie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0, No. 1 (2019), pp. 18–35; and Jason Hickel, “What does degrowth mean? A few points of clarification”, *Globalizations*, vol. 18, No. 7 (2021), pp. 1105–1111.

⁶ Frances Stewart, “Macroeconomic policies for a sustainable world”,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ies*, vol. 24, No. 4 (2023), and Caroline Dommen, “Human rights economics: an inquiry”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July 2022).

⁷ Matthias Schmelzer, *The Hegemony of Growth: The OECD and the Making of the Economic Growth Paradigm*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个令人担忧的情况是，1992年《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也提及了经济增长，其中承诺支持“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该体系将促进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以更好地解决环境退化问题”。⁸ 更近期的多边环境协定也包含此类措辞。⁹

4. 消除贫困的主要方法很大程度上仍然由“增长主义”主导：首先依靠刺激经济增长，然后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重新分配财富。各国政府没有努力让经济更具包容性，确保真正的机会平等，而是把重点放在刺激增长上，认为增长是创造就业和为公共服务和社会政策提供资金的前提。贸易自由化、工作灵活化或创造“有利于企业的投资环境”（降低最大型公司税收和监管负担的代名词）等政策选择是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名义作出的，但这些措施造成社会排斥，考验社会的韧性。在增长成为国家首要任务的背景下，¹⁰ 对增长的无休止追求限制了政治想象力：没有充分探索更有前景的发展途径，这些途径可以更好地促进人类福祉和人权的实现。

5. 这种情况必须被扭转，也可以被扭转。就可持续发展目标自身而言，目标 8 提及“持续、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并包含最不发达国家年增长 7% 的具体目标（具体目标 8.1），具体目标 17.19 要求衡量“补充”国内生产总值方面的进展情况。2023 年 9 月，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一致认为有必要“超越”国内生产总值。¹¹ 这一势头日益强劲。¹² 对后增长发展形式的探索已经开始，¹³ 部分原因是发达经济体已进入长期停滞期。¹⁴ 2024 年 9 月的未来峰会将开启关于今后发展目标的磋商，这为加快对发展形式的探索提供了独特机会。特别报告员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3/10 号决议提交的本报告力求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贡献。

二. 增长的极限

6. 增加国家收入的需要往往被用于解释为何要重点发展经济，经济增长让国家能够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经济增长还被视为创造就业机会的方式，可以弥补因技术变革（包括人工智能）而造成的工作岗位流失。但经济增长在促进就业方

⁸ A/CONF.151/26/Rev.1 (第一卷)，第 1 号决议，附件一，原则 12。

⁹ 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条第 5 款；《巴黎协定》第十条第五款。

¹⁰ John Barry, “A genealogy of economic growth as ideology and Cold War core State imperative”,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25, No. 1 (2020), p. 18.

¹¹ 大会第 78/1 号决议，附件，第 30 段。

¹² Joan Martínez-Alier and others, “Sustainable de-growth: mapping the context, criticism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an emergent paradigm”,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69, No. 9 (2010), pp. 1741–1747; Giorgos Kallis, Christian Kerschner and Joan Martínez-Alier, “The economics of degrowth”,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84 (December 2012), p. 172; and Wouter Vandenhole, “De-grow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thinking human rights law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Law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1, No. 2 (2018).

¹³ Tim Jackson,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Foundations for the Economy of Tomorrow*,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17).

¹⁴ Christine Corlet Walker, Angela Druckman and Tim Jackson, “Welfare systems without economic growth: a review of the challenges and next steps for the field”,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186 (August 2021).

面的作用令人失望：虽然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基于奥肯定律认为需要经济增长来吸收因生产率提高而过剩的劳动力，¹⁵ 但近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就业率之间的相关性极不平衡，自 2012 年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就业率的相关系数仅为 0.34。¹⁶ 经济增长了但就业未增加的情况曾经是例外，但现在正成为常态。¹⁷ 至少在富裕国家，经济增长的“适销期”已过。经济增长不仅没有消除贫困，还让贫困变得“现代化”。增长已经变得“不经济”，破坏了生产性经济本身的基础。

A. 贫困的现代化

7. 贫困通常被定义为缺乏适当生活水准所需的收入，其原因是无法获得体面工作或社会保护方面的差距。这一定义被用于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1—消除贫困的进展情况。按 2017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目前有 6.7 亿人(占世界人口的 8.4%)生活在每天生活费 2.15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预计到 2030 年这一数字将降至 5.75 亿人，与目标相差甚远。¹⁸

8. 为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1.1 进展情况而采用的这种基于货币价值的减贫方法很难反映贫困人口的状况。贫困问题的多维解决办法，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和牛津大学制定的多维贫困指数所采用的办法，不仅力求反映消费或收入方面的匮乏，还反映受教育程度、入学率、饮用水、卫生和电力方面的匮乏。

9. 这种办法更好地反映了多重贫困对个人享有体面生活的能力的影响。然而，这种办法仍然不够充分，未能反映社会排斥的现实，造成社会排斥的原因可能是某些家庭无法满足社会期望，如需要为父母举办体面的葬礼或为子女举办体面的婚礼、支付子女的课外活动费用或拥有智能手机。随着总体富裕程度的提高，这种社会期望也会发生变化。因此，(由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定义的)经济增长如果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最终可能会适得其反：经济增长会提高特定社会的门槛，实际上可能会加剧社会排斥，加剧贫困人口的羞耻感和和无价值感。此外，如果总体富裕程度的提高导致卫生、教育或交通等领域的某些服务更加商业化，理由是大多数人已经有能力支付这些服务，那么收入贫困的影响将更加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增长可以与贫困的现代化共同存在：即使极端的物质匮乏减少，遭受社会排斥的人数却可能增加。¹⁹

¹⁵ Arthur M. Okun, “Potential GNP: its measurement and significance”, Cowles Foundation Paper 190 (1962).

¹⁶ Eloi Laurent, “From welfare to farewell: the European social-ecological State beyond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 2021.04 (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 2021), p. 13.

¹⁷ 另见 Sangheon Lee and others, “Does economic growth deliver jobs? Revisiting Okun’s law”, 国际劳工组织第 17 号工作文件(日内瓦, 国际劳工组织, 2020 年); 以及 M. Sylvania Porras-Arena and Ángel L. Martín-Román, “The heterogeneity of Okun’s law: a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Economic Modelling*, vol. 128 (2023).

¹⁸ 见 https://sdgs.un.org/goals/goal1#progress_and_info.

¹⁹ Olivier De Schutter, *The Poverty of Growth* (London, Pluto Press, 2024).

B. 破坏生产性经济的基础

10. 生态系统提供资源并吸收废物和污染，决定着所谓的生产性经济，也是以国内生产总值指标衡量的经济活动赖以生存的因素。生产性经济也依赖于所谓的再生产经济，这种经济发生在家庭和社区，没有报酬，妇女是主要的贡献者。最后，生产性经济还依赖于“共有物”，许多贫困人口仍然依赖“共有物”来满足基本需求。如果经济增长过程在未认识到上述三重嵌入性的情况下侵蚀了这些基础，那么必然无法减轻贫困。

1. 突破地球极限

11. 经济增长所需的能源和物质资源消耗不断攀升，已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某些人口群体(主要分布在富裕国家)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已将地球远远推到安全运行空间之外。在决定地球稳定和有利于人类福祉和社会发展的生命支持的九个地球极限中，有六个已经被突破。²⁰ 温室气体排放所导致的危险气候失调和极端气象事件虽然可能最广为人知，但并不是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唯一环境压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最近警告称，自 1970 年代中期以来，资源开采量增加了两倍，预计到 2060 年，原料开采量将再增加 60%。²¹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在 2019 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中估计，由于人类活动，地球 75% 的陆地表面已被显著改变，66% 的海洋面积正在遭受日益严重的累积影响，超过 85% 的湿地已经消失，如果不采取行动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驱动因素的强度，数十年内将有大约 100 万个物种面临灭绝。经济增长是这些趋势背后的主要驱动力：“经济激励措施通常会推动扩大经济活动，这往往对环境造成损害，而不是保护或恢复环境”。²²

12. “绿色增长”被寄予厚望，这种增长是指通过更清洁的技术和更高效的生产手段，减少资源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实现与环境压力脱钩的增长。然而，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正日渐凸显。2019 年，一项系统性审查得出结论：“没有经验证据可以证明存在……绝对的、全球性的、永久的、足够快和足够大规模的与(资源和影响两方面)环境压力脱钩的经济增长”。²³

13. 仅就温室气体排放领域(只是所考虑的九个地球极限之一)而言，绝对脱钩甚至没有以应有的速度进行。在关于 36 个经合组织国家 2013-2019 年期间表现的审查报告中，作者得出结论认为，虽然 11 个国家在此期间成功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绝对脱钩，但考虑到公平因素，脱钩的速度达不到这些国家保持在 2015 年《巴黎协定》规定的全球碳预算范围内所需的速度。根据这 11 个国家在所涉期间取得的脱钩成就可以得出，它们平均需要 223 年才能

²⁰ Katherine Richardson and others, “Earth beyond six of nine planetary boundaries”, *Science Advances*, vol. 9, No. 37 (2023).

²¹ 环境署和国际资源委员会，*Global Resources Outlook 2024: Bend the Trend – Pathways to a Liveable Planet as Resource Use Spikes* (Nairobi, 2024)。

²²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面向决策者的摘要》(波恩，2019 年)，第 B5 段。

²³ Timothée Parrique and others, *Decoupling Debunked: Evidence and Arguments against Green Growth as a Sole Strategy for Sustainability* (European Environmental Bureau, 2019), p. 31; and Helmut Haberl and other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vidence on decoupling of GDP, resource use and GHG emissions, part II: synthesizing the insights”,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vol. 15, No. 6 (2020).

将各自 2022 年的排放量减少 95%，在这 223 年期间，它们平均将消耗 2022 年后各自在全球碳预算中剩余“公平份额”的 27 倍(按全球升温保持在 1.5°C 以下的标准)。²⁴

14. 这证实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2022 年提交的第六次评估报告的结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指出，在 2015-2018 年期间，有 23 个国家(占 116 个抽样国家总数的 20%)通过将碳密集型生产外包、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能源结构实现了基于消费的排放与国内生产总值的脱钩，但这种脱钩往往是短暂的，而且大多发生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高的国家(主要是欧盟和北美国家)。在 2015 至 2018 年期间，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另外 67 个国家(占 58%)排放量的增长慢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和基于消费的排放的相对脱钩。在同一期间，包括南非和尼泊尔在内的另外 19 个国家(占 16%)没有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与基于消费的排放的脱钩。这些国家如果继续这一历史趋势，在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时却未能实质性改善生产和能源使用效率，那么国内生产总值的进一步增长可能会导致排放量增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警告称：“尽管绝对脱钩减少了[116 个抽样国家中五分之一国家的]年排放量，但余下的排放量仍在增加大气中的碳浓度。绝对脱钩不足以避免消耗 1.5°C 或 2°C 全球升温限度下的剩余二氧化碳排放预算，也不足以避免气候崩溃。”²⁵

15. 因此，虽然经济正在实现一定程度的脱碳，但却主要限于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高的高收入国家，而且脱碳速度肯定达不到要求。在生物多样性丧失和资源利用等其他环境压力方面，也没有出现类似的绝对脱钩情况。绿色增长没有实现。虽然应加快采用绿色技术和循环经济模式，但它们本身并不能以所需的规模和速度提供解决方案。

2. 对社会有益的工作被低估

16. 对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视掩盖了家务劳动和照料工作的重要性，也掩盖了更加重视这些工作的必要性。每天约有 164 亿小时被用于对年幼子女或年长亲属的直接照料，以及做饭、打扫卫生、取水或拾柴等间接照料。这相当于 20 亿人每天无偿工作 8 小时。如果按最低时薪计算，此类贡献将占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9%。妇女承担了超过四分之三(76.4%)的此类工作，她们从事无酬照料工作的时间是男子的 3.2 倍。²⁶

17. 照料工作对经济至关重要：没有照料工作就不可能有生产性工作。然而，由于照料工作没有以货币价值被衡量，因此一般既不计入社会投资，也不通过社会投资予以支持。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改变。自 2013 年以来，劳动力调查更系统地将无酬家务和照料工作纳入统计，列在“自用服务的提供”项目下；可持续发展

²⁴ Jefim Vogel and Jason Hickel, “Is green growth happen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chieved versus Paris-compliant CO₂-GDP decoupling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Lancet Planetary Health*, vol. 7, No. 9 (2023).

²⁵ Shobhakar Dhakal, Jan Christoph Minx and Ferenc L. Toth, “Emissions trends and drivers”, in *Climate Change 2022: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ara. 2.3.3.

²⁶ Jacques Charmes, *The Unpaid Care Work and the Labour Market. An Analysis of Time Use Data based on the Latest World Compilation of Time-use Surveys* (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2019 年)，第 47 页。

目标包括“承认和重视无酬照料和家务工作”这一具体目标(关于性别平等的目标 5 下的具体目标 5.4)。

18. 对无酬家务和照料工作的承认是第一步，可确保将此类工作纳入经济分析并在公共政策中加以考虑；可确保今后雇主将抚养和教育子女或照料受抚养亲属视为宝贵的工作经验；确保提供带薪育儿假和其他面向照料者的假期；确保按照《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将“照料贡献”纳入养老金的计算。²⁷此外，各国政府应缩小家务和照料工作的范围并减轻负担，这意味着要确保普及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和家庭能源系统，确保提供负担得起的优质照料服务，并制定政策，为父母提供养育子女方面的支持，同时为其他照料者提供支持。最后，应重新分配照料和家务责任，在实现性别平等和改善所有人的工作与生活平衡方面取得进展。然而，如果不同时增强代表性，这些目标都无法实现：照料工作者和妇女权利组织尤其应参与工作场所、社区和政策领域的决策论坛，以保证“有酬和无酬照料人员都能就建立优质照料和体面工作条件发表意见”。²⁸

19. 除家务和照料工作外，“增长主义”还导致对社会有积极贡献的工作被低估，“增值”的工作被高估：例如，正如“基础经济”学者所强调的²⁹，只有最赚钱而非最有用工作才能获得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包括工作保障)，得到更好的回报。³⁰

3. 共有物被侵蚀

20. 在许多社区，共有物即集体管理的资源和机构一直是获得水、牧场或食物，或卫生保健或教育等方面服务的基础。保护共有物不受市场力量和私有化影响以及不被国家占有非常重要，为更好地顾及这种必要性，人权标准正在逐步演变。最近的文书明确提及基于习惯保有形式的共有财产制度，其目的是确保这种制度受到保护，不被损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2012 年核可的《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规定，各国应确保权属治理应“承认并尊重……正当权属权利，包括目前不受法律保护的正当地权权属权利”(准则 5.3)，如果存在“集体使用和管理的公有土地、渔场和森林(在某些国家被称为共有物)，各国应……承认并保护，包括在国家分配的过程中承认并保护此类公有土地、渔场和森林及相关的集体使用和管理制度”(准则 8.3)。

2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渔业委员会经过三年的参与性进程于 2014 年通过的《粮食安全和扶贫背景下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以及联合国大会 2018 年 12 月 17 日通过的《联合国农民和农村地区其他劳动者权利宣言》中也有类似表述。³¹

22. 除了禁止国家剥夺人民获得赖以生存的资源权利外，人权法还规定了不干扰基于共有做法(共有资源的集体管理)的资源生产和分配的义务，这是不干涉各

²⁷ 见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Trujillo Calero* 诉厄瓜多尔(E/C.12/63/D/10/2015)。

²⁸ 增强妇女经济权能高级别小组，“Leave no one behind: taking action for transformational change on women’s economic empowerment”(2017)。

²⁹ 见 <https://foundationaleconomy.com>。

³⁰ A/78/175，第 49-54 段。

³¹ 特别见，第 5(1)和第 28 段。

项权利享有的更广泛义务的一部分。如果与这些权利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由社区自身提供，或者这些权利的享有取决于对某些资源(如土地和水)的现有获取，那么相关义务就应是尊重基于共有做法的制度安排。虽然这一义务主要针对土地或自然资源而确定，但义务对象并不仅限于此。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关于适当住房权的第 4 号一般性意见(1991 年)中，将可持续获得自然资源和共有资源确定为适当住房的一个要素(第 8(b)段)。社区主导的住房合作社，如 2016 年泰国推出的 Baan Mankong 计划³² 或中欧和东南欧的欧洲合作社协会 MOBA 住房网络³³，说明了基于社区的举措在确保获得住房方面的潜在贡献。³⁴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关于社会保障的权利的第 19 号一般性意见(2007 年)中指出，国家在遵守社会保障权义务的框架内，应不“任意或不合理地干涉社会保障的自助安排、习惯安排或传统安排”，或“干涉个人或法人团体为提供社会保障而建立的机构”(第 44 段)。

23. 在某些情况下，相较于私有化进程后个人所有者的管理或国家管理，地方社区管理共有资源的方式更可持续、更有效。³⁵ 就设计最适合本地情况的治理制度而言，地方社区处于最佳位置。由本地社区制定的规则会被社区成员视为高度合理，而且参与确立治理制度的社区成员有推动执行规则的强烈动机。最后，由于制定规则的目的是改善整个社区而不是个别社区成员的状况，因此规则的设计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外部效应，维护资源的长期存续能力，从而提高可持续性。³⁶ 通过共有方式提供服务有许多好处，包括增强当地社区的能力，使其能够制定适合自身的解决方案，实现包容性获取，以及加强问责制。然而，为了创造新的市场和从资源开发中获取最大利润，对增长的追求往往鼓励私有化进程，进而侵蚀了共有物。³⁷

三. 没有增长的发展

24. 引导经济体走向后增长场景并不意味着实行紧缩；也不应与衰退混为一谈，尽管衰退的特点是负增长率。相反，引导经济走向后增长的未来意味着以民主方式规划经济转型，减少对增长的迷信，从而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减少不平等。如果人们仍将经济增长与进步和福祉的改善画等号，那么试图引导社会摆脱对增长的追求的努力就会遇到阻力。³⁸ 因此，后增长的发展方式要取

³² 见 <https://en.codi.or.th/baan-mankong-rural>。

³³ 见 <https://moba.coop>。

³⁴ 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全球倡议，“The commons and public services: a new way forward or an alternative to human rights?” (2024)。

³⁵ Stéphanie Leyronas, Benjamin Coriat and Kako Nubukpo, eds., *The Commons: Drivers of Change and Opportunities for Af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23)。

³⁶ 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Arun Agrawal, “Common property institutions and sustainable governance of resources”, *World Development*, vol. 29, No. 10 (2001), pp. 1649–1672; and Michael Cox, Gwen Arnold and Sergio Villamayor Tomás, “A review of design principles for 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Ecology and Society*, vol. 15, No. 4 (2010)。

³⁷ 私有化对公共财产的影响，见 A/73/396。

³⁸ Milena Büchs and Max Koch, “Challenges to the degrowth transition: the debate about wellbeing”, *Futures*, vol. 105 (2019), pp. 155–165。

得成功，就必须加强民主：参与式民主尤其可以让人们对某些关于增长与福祉或幸福之间相关性的普遍假定提出质疑。³⁹

25. 确保以实现人权为基础的福祉，不能与满足“追求更多”的无限欲望混为一谈，后者是企业的营销战略制造出来的，并受地位竞争和对“地位产品”追求的驱动。⁴⁰ 相反，以人权为基础的充分性标准应取代基于消费者主权的不切实际期望。⁴¹ 充分实现人权需要的不是为满足无限的需求而无休止地努力，而是需要保障一系列权利，让个人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蓬勃发展。儿童权利委员会强调，应当以可持续的方式实现享有适当住房、粮食、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包括在物质消费、资源和能源使用以及空间和自然占用方面采用可持续的方式。⁴²

26. 民主商讨应确保现有资源主要用于确保(在卫生、教育、公共交通、能源供应和住房等领域)提供适当水平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而不是迎合购买力最高的群体所表现的需求。⁴³ 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增长的未来是一个注重充分实现人权的未来：这与为了所谓削减公共开支的必要性而牺牲权利的做法截然相反。

A. 重视重要因素

27. 近年来，在设计和使用国内生产总值之外的替代性社会进步指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⁴⁴ 一些国家引入了多种形式的福祉指数，一些国家则走得更远，利用此类指标来指导政策。2008年，不丹推出了国民幸福总值指数，旨在通过涵盖心理、卫生、文化和环境健康的9个领域和33个指标来衡量进展情况；《不丹宪法》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国民幸福总值。⁴⁵ 厄瓜多尔和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的宪法都将“美好生活”作为发展方面的指导框架。⁴⁶ 在苏格兰政府内部，国家绩效股根据家庭调查结果评估实现国家成果(根据2007年启动的国家绩效框架设定)方面的进展情况。在威尔士，后代福祉专员负责评估《2015年后代福祉法》的执行情况。2019年，新西兰成为首批实施福祉预算的国家之一，此

³⁹ Jonas Lage and others, “Citizens call for sufficiency and regulation – a comparison of European citizen assemblies and national energy and climate plans”,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vol. 104 (2023).

⁴⁰ Fred Hirsch,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7); and Robert H. Frank, “Positional externalities cause large and preventable welfare loss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No. 2 (2005), pp. 137–141.

⁴¹ Doris Fuchs and others, *Consumption Corridors: Living a Good Life within Sustainable Limits* (London, Routledge, 2021), p. 69.

⁴² 第26号一般性意见(2023年)。另见 Andreas Buser, “From doughnut economics to doughnut jurisprudence: a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vol. 24, No. 2 (即将出版)。

⁴³ Timothée Parriqu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growth”,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é Clermont Auvergne and Stockholm University, 2019.

⁴⁴ Rutger Hoekstra, *Replacing GDP by 2030. Towards a Common Language for the Well-Being and Sustainability Community*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⁴⁵ Milan Thomas and Yangchen C. Rinzin, “What is Bhutan’s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Asian Development Blog, 20 March 2023, 可查阅 <https://blogs.adb.org/blog/your-questions-answered-what-bhutan-s-gross-national-happiness-index>。

⁴⁶ Alberto Acosta, “El buen (con)vivir, una utopía por (re)construir: alcances de la Constitución de Montecristi”, *Obets Revista de Ciencias Sociales*, vol. 6, No. 1 (2011), pp. 35–67 (in Spanish); and Martin Calisto Friant and John Langmore, “The *buen vivir*: a policy to survive the Anthropocene?”, *Global Policy*, vol. 6, No. 1 (2015), pp. 64–71.

种预算将福祉和环境置于政府预算编制过程的核心，而不是狭隘地关注国内生产总值；该国的生活水准框架看板有助于以超越财政和经济影响的方式作出政治选择。

28. 2020 年，经合组织秘书长新增长叙事咨询小组建议政策制定者在新的经济理论、分析和政策框架中考虑四个核心目标：环境可持续性、福祉的增加、不平等的减少和制度的韧性。⁴⁷ 咨询小组承认“收入很重要，对低收入人群来说尤为重要”，但同时强调，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不会自动产生“充实和繁荣生活”所需的“其他各种因素”。事实上，咨询小组指出，无论期望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取得何种进步，“其增长方式往往会损害这些进步，特别是在私人消费优先于公共物品的情况下，收入较低、工作较不稳定的人尤其会受到影响”。⁴⁸

29. 联合国也发挥了作用。开发署自 1990 年以来一直在制定人类发展指数，用于概况性地衡量不同国家在人类发展三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健康长寿、知识获得和拥有体面的生活水平。⁴⁹ 在确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7.19 之前，大会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通过了第 65/309 号决议，其中大会认识到，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本质上并非是为了反映、也没有充分反映一国人民的幸福和福祉，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可能阻碍可持续发展，有必要采取更加包容、公平和均衡的经济增长办法，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加强所有人的幸福和福祉。此外，大会请会员国继续制定更多措施，在其中更好地体现追求幸福和福祉在发展中的重要性，以指导本国的公共政策。事实上，可持续发展目标本身提供了一个替代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指标，可以用于指导公共行动。

30. 秘书长在关于《我们的共同议程》报告的政策简报 4 中承认，国内生产总值并不代表人类福祉，并概述了以超越国内生产总值的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多种办法。⁵⁰ 秘书长指出，福祉、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是多层面的复杂问题，无法通过国内生产总值等单一概括性指标处理，⁵¹ 他对涵盖一切的单一综合指标的效用提出质疑，认为这种指标可能汇总了太多内容，但揭示的问题却太少，无法充分提供政策参考。⁵² 相反，秘书长支持建立一个重视重要因素的概念框架，其重点是实现三个成果(福祉和能动性、尊重生命和地球、减少不平等和加强团结)和三个要素(参与性治理和更强有力的机构、创新和道德经济、从脆弱性到韧性的过渡)。⁵³ 秘书长在政策简报中提议设立一个独立的高级别专家组，为可能的指标制定总汇。

31. 总的来说，这些确定福祉指标的尝试存在三个不足之处。首先，这些尝试被认为是随意的，未经过协商一致，也不客观：福祉组成部分的清单和每个组成部分被赋予的权重都可能存在争议。第二，这些尝试不包含问责要素：除极少数例外

⁴⁷ 经合组织，*Beyond Growth: Towards a New Economic Approach* (巴黎，2020 年)。

⁴⁸ 同上，第 17 页。

⁴⁹ 见 <https://hdr.undp.org/data-center/human-development-index#/indicies/HDI>。

⁵⁰ 秘书长，“重视重要因素：超越国内生产总值的进展框架”，我们的共同议程政策简报 4(2023 年 5 月)，第 3 和第 8 页。

⁵¹ 同上，第 10 页。

⁵² 同上。

⁵³ 同上，第 9 页。

情况外，政府可能通常会忽视福祉指标所发出的警示信号。出于这两个原因，将人权作为福祉指标的基础并允许人权机制监测遵守情况是非常可取的。第三，虽然社会能够以这些指标为工具，了解其前进方向，但相关尝试却无法确定解决办法。相关尝试可能会提醒社会需要改变方向，但却无法说明如何改变。特别报告员将在下文中探讨一些行动途径。

B. 消除不平等

32. 消除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这一“纵向不平等”(而不是人权法传统上更关注的群体之间的“横向不平等”)在寻求消除贫困的后增长办法方面应被置于核心位置。

33. 首先，不平等(包括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不平等)让最富裕的人掌握了资源，导致这些资源无法被用于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生产体系越是以欲望为导向，就越会导致收入差距持续存在，就会有越多的资源被转用于满足富人的欲望而非贫困人口的需求。因此，如果在经济中放任高度不平等的存在，经济在满足贫困人口需求方面的效率就会降低。

34. 第二，由于最富裕群体的投资选择，少数精英阶层的财富积累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自1990年以来，占世界人口1%的最富裕人群的排放量占新增总排放量的23%(而占世界人口50%的最贫困群体的排放量仅占新增总排放量的16%)；最富裕人群的大部分排放量源自他们的投资而非消费。⁵⁴

35. 第三，减少不平等将遏制只有最富裕人口阶层(主要分布在富裕国家)才能负担得起的最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世界上最富有的10%人口(其中三分之二生活在高收入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36%至45%，而新兴经济体的中等收入和最贫困公民的生活和消费方式产生的排放量比高收入国家的同类人群低5至50倍。⁵⁵ 问题不仅在于精英阶层的财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消费模式，还在于不平等本身，因为不平等促使通过物质消费进行地位竞争。事实上，在个人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后，我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并不是因为能够获得舒适感，而是因为我们向周围的人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不平等的社会通过消费推动了对地位的永久竞争。⁵⁶ 另一方面，在更加平等的社会中，或者可以通过消费以外的方式体现地位的社会中，为满足工作—支出—消费这一循环所需的生长就变得不那么必要。⁵⁷

36. 第四，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会造成政治后果。经济支配地位很容易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使人口中最富有的群体和最强大的经济行为体能够否决对他们所受益现

⁵⁴ Lucas Chancel, “Global carbon inequality over 1990–2019”, *Nature Sustainability*, vol. 5, No. 11 (2022), pp. 931–938.

⁵⁵ Dhakal, Minx and Toth, “Emissions trends and drivers”, paras. 2.6.1 and 2.6.2.

⁵⁶ Olivier De Schutter, Kate Pickett and Richard Wilkinson, “Equality as an ingredient for a post-growth world”, in *Transformative Ideas - Ensuring a Just Share of Progress for All*, Kalina Arabadjieva and others, eds. (Brussels, 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 2023), pp. 81–92.

⁵⁷ Richard Wilkinson and Kate Pickett, *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London, Allen Lane, 2009), p. 226.

状构成挑战的任何变革。⁵⁸ 此外，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公民参与度普遍较低，虽然贫困人口因空气和水污染等问题上的不作为受到了最严重影响并且无法保护自己，但他们因获取信息和权力方面的差异无法采取行动。⁵⁹

37. 因此，不平等会导致恶性循环。不平等导致经济的金融化，而金融化是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主要来源，不平等还刺激富人追求更大的房子、马力更大的汽车、异国情调的旅行，这种消费模式与边缘化社区和低收入家庭争夺稀少资源的使用。这些社区和家庭被排除在出价过程之外，即便在资源足以确保所有人享有体面生活的情况下，他们最终可能也无力满足自身需求。受地位竞争和炫耀性消费驱动的富人生活方式加强了当前全球经济体系的消费驱动模式，这种模式依赖于不断增加的消费品生产和购买来维持经济增长。这种生活方式与减少环境压力的必要性完全不相容。然而，富人对资产的控制使得在现状中发展壮大的强大经济行为体能够否决任何可能威胁其支配地位的重大改革。

C. 从利润驱动型经济转向人权经济

38. 进行经济改革，减少经济对市场的依赖，可以使社会摆脱踟躇不前的状况：由于需要增加利润，只能通过刺激过度消费来维持过度生产，从而将人们禁锢在就业—消费的循环中，这对享有繁荣生活构成了障碍。在消费端，应减少支付能力对获得充分享有人权所必需的产品和服务的限制，进而减少获得有酬工作在这方面的限制。在生产端，生产机制应更加注重满足基本需求，而不是满足由公司营销战略制造并受地位焦虑刺激的需求。由此可以得出五个优先事项。

1. 刺激社会互助经济

39. 社会互助经济涵盖“在分配和使用盈余和(或)利润以及资产时，以人和社会为目的并将这一目的置于资本之上”的企业。⁶⁰ 这些企业生产商品并提供服务，以履行其成员确定的社会使命。⁶¹ 因此，企业的目标不是回报投资者，而是满足社会的需求。⁶²

40. 社会互助经济的企业不能向股东重新分配股利，或者在回报投资者的能力方面受到严格限制。它们的红利是一种“耐心资本”，不鼓励短期收益，也不允许财富积累或金融投机。⁶³ 所产生的任何盈余将再投资于公司，或通过其采购政

⁵⁸ Martin Gilens, *Affluence and Influence.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and Alessandro Roncaglia, *Power and Inequality: A Reformist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4).

⁵⁹ James K. Boyce, “The environmental cost of inequality”,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319, No. 5 (2018), p. 72; 和 James K. Boyce, *Economics for People and the Planet: Inequality in the Era of Climate Change* (Anthem Press, 2019)。

⁶⁰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体面工作以及社会互助经济的决议，ILC.110/Resolution II 号文件，2022年6月10日，第5段。

⁶¹ Sybille Mertens, *La gestion des entreprises sociales* (Liège, Edipro, 2010).

⁶² Walter W. Powell and Richard Steinberg, *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 2nd 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⁶³ Matthew Thompson, “Social economy and social enterprise”,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Audrey Kobayashi, ed., 2nd ed., vol. 12 (Elsevier, 2020), pp. 239–247.

策或销售政策等方式进行隐性再分配。此外，社会经济企业的治理是民主的：投票权与投资资本的数额无关，每个股东通常都有一票，大多数股东将有双重身份：投资者—工人、投资者—消费者，甚至是投资者—供应商。⁶⁴ 这种民主式决策确保企业的战略决定不是为了利润最大化，而是为了促进其成员的利益和(或)普遍利益。⁶⁵

41. 对营利型企业而言，增长是吸引投资者的必要条件，其利润依赖于榨取性的商业做法(因为它们必须获取更多，回馈更少)，与之相比，社会互助经济的企业可以将经济可行性与增长的必要性脱钩。

2. 工作的民主化

42. 虽然民主治理是社会互助经济的特征，但所有公司，包括营利部门的公司，都可以而且应该鼓励工作场所的民主。⁶⁶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工会会反对向更具环境可持续性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转型，尤其是在高污染或资源密集型行业，但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⁶⁷ 工人对健康安全的工作条件的关注，往往与对环境破坏性较小的生产方式的追求相契合。在受某些生产工艺造成的废物和污染影响的群体中，工人比股东更为常见。最后，让工人在塑造公司战略决策(包括全球供应链中的战略决策)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将减少公司将生产链中污染最严重的环节外包给不存在环境法规或环境法规执行不力的管辖区的动机。

43. 通过确保工人能够以工作以外的方式获得生活必需品，可以加强工作的民主化。实行就业保障⁶⁸ 或提供普惠基本服务将削弱公司施行“工作勒索”的能力，从而也支持工人努力确保利润的增加不会优先于工人或社区的健康。⁶⁹

3. 共享用工

44. 缩短工作时间在减少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压力方面具有重大潜力。⁷⁰ 一项研究比较了1970-2007年29个高收入经合组织国家的情况，结果表明，缩短工作时间减少了生态足迹(衡量标准是：为满足与食品、住房、交通、消费品和服务有关的需求所需要的提供资源并吸收废物的生物生产性土地的表面积)、碳足迹(一国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包括进口中的碳排放)和领土碳排放(在所涉地

⁶⁴ 经合组织，“What is the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 A review of concepts”, OECD Local Economic and Employment Development Papers, No. 2023/13 (2023)。

⁶⁵ 同上。

⁶⁶ 见全球6,000多名科学家提出的论点，网址：www.DemocratizingWork.org。

⁶⁷ Paul Guillibert, *Exploiter les vivants: une écologie politique du travail* (Paris, Amsterdam Editions, 2023) (in French).

⁶⁸ A/HRC/53/33.

⁶⁹ J. Mijin Cha and others, *Workers and Communities in Transition: Report of the Just Transition Listening Project* (Labor Network for Sustainability, 2021); 和 Alyssa Battistoni, “Sustaining life on this planet”, in *Democratize Work: The Case for Reorganizing the Economy*, Isabelle Ferreras, Julie Battilana and Dominique Méda, ed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2), pp. 103–110.

⁷⁰ 缩短工作时长还可能在性别平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也是确保无酬家务和照料工作得到更多重视的一种手段：见 De Schutter, *The Poverty of Growth*, 第89和90页。

区的边界内产生的碳排放)。⁷¹ 同样，一项关于瑞典家庭时间使用和消费模式的研究表明，工作时间每减少 1%，能源使用和温室气体排放可分别减少约 0.7% 和 0.8%。⁷² 研究发现，在美利坚合众国，长时间工作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明显关系：这种关系既归因于长时间工作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也归因于长时间工作的工人因时间贫困而选择的碳密集型生活方式。⁷³

45. 这方面存在两个作用机制。第一，工作时间的减少通常会致收入下降，从而迫使家庭减少消费。第二，工作时间的减少可为能源密集程度较低但耗时更多的消费模式(如做饭而不是购买预制饭菜)和自我生产活动创造空间，从而减少对市场的依赖。第一种机制在工作时间缩短与工资下降同时发生的情况下尤为重要，只有在充分保障获得基本生活工资和公平薪酬的权利⁷⁴ 以及增加公共投资以提供普惠基本服务的前提下，才应鼓励这种发展。

4. 反对消费主义

46. 消费主义是指通过营销和不断创新来刺激消费。反对不平等的斗争与反对消费主义的斗争相重叠。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营销战略的目标不是通过确定未满足的需求来满足需要，而是模糊需求与欲望之间的区别，创造新的欲望对象。⁷⁵ 这种情况加上不断加快的创新步伐，导致私人消费品迅速淘汰，这有利于商业不受限制地增长。消费主义还加剧了低收入者受到的排斥，他们无法跟上因上述原因不断变化的社会期望。⁷⁶ 禁止广告营销、禁止有计划地淘汰商品和引入维修权都有助于寻求后增长的战略。

5. 提供普惠基本服务

47. 除了通过保障基本生活工资权和公平报酬权⁷⁷ 以及加强社会保护来提高收入外，各国政府还应为提供普惠基本服务作投入，确保人人都能获得确保实现人权的服 务：⁷⁸ 适当住房、卫生保健、校餐中的营养食品、水和能源、交通和数

⁷¹ 具体而言，该研究得出结论，减少 10% 的工作时间将使生态足迹、碳足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减少 12.1%、14.6% 和 4.2%。见 Kyle W. Knight, Eugene A. Rosa and Juliet B. Schor, “Reducing growth to achiev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e role of work hours”, in *Capitalism on Trial: Explorations in the Tradition of Thomas E. Weisskopf*, Jeannette Wicks-Lim and Robert Pollin, ed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3), pp. 187–204.

⁷² Jonas Nässén and Jörgen Larsson, “Would shorter working time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 analysis of time use and consumption in Swedish household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 vol. 33, No. 4 (2015), pp. 726–745.

⁷³ Jared B. Fitzgerald, Juliet B. Schor and Andrew K. Jorgenson, “Working hours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7–2013”, *Social Forces*, vol. 96, No. 4 (2018), pp. 1851–1874.

⁷⁴ A/78/175.

⁷⁵ Joseph J. Merz and others, “World scientists’ warning: the behavioural crisis driving ecological overshoot”, *Science Progress*, vol. 106, No. 3 (2023).

⁷⁶ A/75/181, 第 49-52 段。

⁷⁷ A/78/175.

⁷⁸ 见民间社会团体和专家组成的大型联盟 2022 年 12 月通过的《我们的未来是公共的：圣地亚哥公共服务宣言》。

字接入。⁷⁹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不胜枚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国民保健服务、维也纳的 42 万套社会住房、瑞典提供的托儿服务以及卢森堡 2020 年推出的免费公共交通。

48. 如果通过强有力的再分配征税制度提供资金，普惠基本服务可有助于减少不平等。普惠基本服务越能满足基本需求，收入差距的影响就会越小，低收入家庭受到的损害也就越少。普遍提供基本服务还可以避免在分配服务时基于经济状况调查确定服务对象的做法所带来的风险，这种做法通常会导致包容性不足和较高的未纳入率。⁸⁰ 普遍提供基本服务在政治上也更具有可持续性，因为纳税人和选民可能更支持不仅惠及低收入者而且惠及全体人民的预算承诺。⁸¹ 通过社会生态公共采购和生态设计，普惠基本服务还可以确保通过减少环境压力的方式提供服务：例如，社会住房项目可以建造隔热性能良好的房屋；在能源供应中优先考虑清洁能源；学校供餐计划可以优先考虑向采用农业生态生产模式的当地小规模农户采购食品；投资公共交通可以减少道路上的汽车数量。

四. 突出的挑战

49. 在引导经济向实现人权转变而不是增加货币价值产出方面，仍然存在重大障碍。文化障碍是真实存在的：许多人仍然认为经济增长等同于人类进步。政治经济问题也不容小觑：从现状中获益的行为方将试图反对变革。⁸² 除了提供必要的支持外，决策者还面临两个关键挑战，下文将就此进行讨论。

A. 国家服务供资

50. 人们普遍认为，国家向民众提供服务以及投资于绿色转型(如可再生能源或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所需的资金需要依靠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事实上，二十世纪初在发达经济体中出现的福利国家，其资金主要来自工人和雇主的缴款以及所得税。在消费需求(在凯恩斯主义的方法中，消费需求本身就得到了收入支助计划的支持)的刺激下，经济活动稳步增长，让政府能够(在卫生、教育、公共交通和住房等领域)为民众提供一系列服务，并(通过缴费制度和非缴费形式的社会援助)加强社会保护。未来，随着各国面临人口老龄化(预期寿命增加和生育率降低的结果)和家庭的变化(离婚率上升和单亲家庭增多)，需求特别是对卫生保健和养老金的需求将继续增长：经合组织国家 65 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比较值从 1950 年到 2015 年翻了一番，到 2075 年可能会再翻一番。⁸³

⁷⁹ Anna Coote and Andrew Percy, *The Case for Universal Basic Services*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Polity, 2020).

⁸⁰ A/HRC/50/38.

⁸¹ Walter Korpi and Joakim Palme, "The paradox of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egies of equality: welfare state institutions,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3, No. 5 (1998), pp. 661–687.

⁸² Hubert Buch-Hansen, "The prerequisites for a degrowth paradigm shift: insights from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146 (April 2018), pp. 157–163.

⁸³ 经合组织, *Pensions at a Glance 2017: OECD and G20 Indicators* (巴黎, 2017 年)。

此外，经济的“绿化”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一更大范围的目标将需要大量投资。⁸⁴

51. 当今的挑战是如何在不进一步增加(以国内生产总值指标衡量的)经济活动总流量的情况下为这些国家政策提供资金。⁸⁵ 虽然拥有货币主权(发行自己的货币，商品和服务供应商将这种货币作为支付货币)的国家可以承担高额度的公共债务，但仍然存在重大的制约因素。⁸⁶ 如果实体经济无法满足需求，过高的需求(包括对公共供给的需求)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在某些生产形式(如基于化石燃料的生产)受到抑制或逐步淘汰的情况下，这种情形尤其可能出现。此外，如果因公共支出而增加的需求会刺激经济活动的扩张，从而进一步加大环境压力，那么货币形式的供资将适得其反。因此，对公共支出的依赖应严格面向有利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的生产：公共支出应支持生产低收入家庭享受所有人权和达到适当生活水准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并且应伴随着不必要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全面减少，特别是那些生产过程中消耗最多资源和能源的产品和服务。⁸⁷

52. 然而，就这个问题而言，许多国家并不拥有货币主权，因为它们不发行本国的货币(例如非洲金融共同体区或欧元区的成员国)，或者因为它们依靠出口来支付技术或资本货物的进口或者依靠出口偿还外债，此类情况下的还款以外币计价。这些国家也应设法为向民众提供服务筹措资金，同时减少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依赖。⁸⁸

53. 可以探索多种途径。国家可以将相关努力更多地转向注重福祉的预防性方法：例如，防治空气污染、改善住房条件、营养或获得绿色空间和体育活动的机会可以减少健康风险；⁸⁹ 投资于公共交通将减少车祸数量。针对社区提供支助能力(例如让更多老年人留在家庭环境中)的投资也能带来益处。⁹⁰ 在应对冠状病毒

⁸⁴ 有关估算见 Vera Songwe, Nicholas Stern and Amar Bhattacharya, *Finance for Climate Action: Scaling up Investment for Climate and Development*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022); Vitor Gaspar and others, “Fisc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human, social, and physical investments for the SDGs”, Staff Discussion Notes, No. 2019/003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9); and Homi Kharas and John W. McArthur, “Building the SDG economy: needs, spending, and financing for universal achievemen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Glob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No. 131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9)。

⁸⁵ Daniel W. O’Neill and others, “A good life for all within planetary boundaries”, *Nature Sustainability*, vol. 1, No. 2 (2018), pp. 88–95.

⁸⁶ Stephanie Kelton, *The Deficit Myth: Modern Monetary Theory and How to Build a Better Economy* (London, John Murray, 2020).

⁸⁷ Christopher Olk, Colleen Schneider and Jason Hickel, “How to pay for saving the world: modern monetary theory for a degrowth transition”,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214 (December 2023).

⁸⁸ Milena Büchs and Max Koch, *Postgrowth and Wellbeing. Challenges to Sustainable Welfa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⁸⁹ Olivier De Schutter and others, *The Escape from Poverty. Breaking the Vicious Cycles Perpetuating Disadvantage* (Bristol, Policy Press, 2023), pp. 18–43; 和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 “Closing the gap in a generation: health equity through action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日内瓦, 世界卫生组织, 2008年)。

⁹⁰ Stephen Quilley and Katharine Zywert, “Livelihood, market and State: what does a political economy predicated on the “individual-in-group-in-PLACE” actually look like?”, *Sustainability*, vol. 11, No. 15 (2019).

毒病大流行(COVID-19 疫情)过程中出现的创新,如配送食品和药品或电话联系被隔离的居民,被描述为“正是可能适合后增长社会的预防性、关系型、多层次的福利”。⁹¹ 可以削减不必要、甚至有害的公共开支:2020年,化石燃料补贴占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8%(或5.2万亿美元),其中90%是隐性补贴,其背后的原因是未能强制将化石燃料能源使用的负面外部效应(形式为空气污染、造成全球变暖、交通拥堵和道路事故)内部化。⁹²

54. 因此,虽然需要各国付出的总体努力并非难以完成,但仍需要大量额外资金。关键是要在不依赖增长的情况下,在逐步放弃对增加总产出价值的关注的宏观经济环境中,为绿色转型以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方面的投资提供资金。为解决这一问题,各国除了向工人征收所得税或让工人和雇主缴纳社会缴款外,还应寻求其他公共收入来源。⁹³ 有多种可用办法。特别报告员在先前的报告中遗憾地指出,世代相传的遗产和赠与往往不被征税,或只被征收很低的税,这不仅使国家失去收入,而且使不利地位长期存在。⁹⁴ 他还主张征收碳税,前提是低收入家庭能从改革中受益,为此类家庭提供货币补偿和清洁能源。⁹⁵ 还应采取更多措施,打击推动国家间财政竞争的激进税收优化策略:公司跨境滥用税收以及个人将财富转移到低税收管辖区或避税地,这两种行为分别导致国家税收损失3,110亿美元和1,690亿美元。⁹⁶ 还可以对最富有的个人征收财富税:对世界上最富有的个人(65,000名亿万富翁)征收1.5%至3%财富税,每年将产生3,000亿美元的税收。⁹⁷ 这不仅能增加公共收入,还能减少为提高国家税收而鼓励人们增加工作和消费的必要性;还能解决已经极其严重的不平等问题。

B. 全球相互依存的关系

55. 当前的增长模式是严重的不等价交换的根源,在这种模式下,全球北方的增长依赖于对全球南方资源的开采,而全球南方的财富创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为富裕国家的高价值市场提供生产,这种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偿还以硬通货计价的外债。⁹⁸ 因此,北方国家造成了南方国家的社会和生态代价,全球南方国

⁹¹ Corlet Walker, Druckman and Jackson, “Welfare systems without economic growth: a review of the challenges and next steps for the field”, p. 8.

⁹² Ian Parry, Simon Black and Nate Vernon, “Still not getting energy prices right: a global and country update of fossil fuel subsidies”, IMF Working Paper, No. 2021/236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1).

⁹³ Kallis, Kerschner and Martínez-Alier, “The economics of degrowth”.

⁹⁴ A/76/177, 第52段。

⁹⁵ A/75/181, 第13-19段。

⁹⁶ Tax Justice Network, *State of Tax Justice 2023* (2023).

⁹⁷ Lucas Chancel, Philipp Bothe and Tancrede Voituriez, “The potential of wealth taxation to address the triple climate inequality crisis”, *Nature Climate Change*, vol. 14, No. 1 (2024), pp. 5–7.

⁹⁸ Prapimphan Chiengkul, “The degrowth movement: alternative economic practices and relevanc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vol. 43, No. 2 (2018), pp. 81–95; and Jeffrey Althouse, Giulio Guarini and Jose Gabriel Porcile, “Ecological macroeconomics in the open economy: sustainability, unequal exchange and policy coordination in a center-periphery model”,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172 (June 2020).

家依赖于北方国家的转让和进口。任何“超越增长”的战略都不应忽视从殖民统治模式中沿袭下来的这种依赖性。⁹⁹

56. 克服这种依赖性需要以公平的方式分配行动。富裕国家的经济已经变得过于臃肿，而低收入国家的经济仍然过于单薄：应支持低收入国家进一步努力扩大经济。国际社会在这方面提供的支持应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既要考虑到各国过去造成的环境压力，也要考虑到各国通过财政资源和技术来扭转这一趋势的能力。¹⁰⁰ 发达国家“在减少和消除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以及促进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方面负有特殊责任，特别是应为此提供资金援助和无害环境的技术”。¹⁰¹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也体现在《2030年议程》中，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10.a 和 12.1，还体现在《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中。¹⁰² 同样，《关于后代人人权的马斯特里赫特原则》将逐步淘汰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列为实现后代人人权方面的义务之一，并补充指出：“较富裕国家必须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更迅速地[实现这一目标]”。¹⁰³

57. 然而，即使在低收入国家，也不应将生产总值的增加等同于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只是衡量生产的一个指标。¹⁰⁴ 所创造的增量财富应惠及当地社区，提供体面的工作机会并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投资，包括用于人类发展的基础设施。

58. 北南之间的结构性依赖可能需要采取“去增长”的北南贸易模式，转而发展南南贸易以及地方和区域市场；¹⁰⁵ 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的生产能力，以满足其自身需求，包括为此进行技术转让和新产业保护；¹⁰⁶ 支持债务重组和债务豁免，确保重债穷国不被迫为全球市场生产，而是能够优先满足本国社会的需求。

五. 结论和建议

59. 2024年9月的未来峰会将通过《未来契约》，其中应明确提出向后增长发展轨道过渡，即在发展中注重实现人权，而不是提高生产和消费的总体水平。然而，这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仅在地方或国家层面就能实现。摆脱对增长的依赖需要多年期战略，也需要不同治理层面的努力。

⁹⁹ Claudius Gräbner-Radkowsitch and Birte Strunk, “Degrowth and the global South: the twin problem of global dependencies”, ICA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42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 Institute for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Economy, 2023), p. 18.

¹⁰⁰ 见《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原则 7；《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条；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

¹⁰¹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法原则的新德里宣言》，第 3.4 段。

¹⁰² 具体见第 59 段。

¹⁰³ 第 20(c)(ix)条。

¹⁰⁴ A/HRC/54/27.

¹⁰⁵ Michael J. Bloomfield, “South-South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Ceylon tea”,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167 (January 2020).

¹⁰⁶ Ha-Joon 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Anthem Press, 2002).

60. 总体目标应是重塑经济，生产对社会更有用和生态上更可持续的产品和服务，并大幅减少不必要和会造成浪费的生产。在多个治理层面就转型作出适当排序和协调是关键所在。

61. 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初步评估了采取后增长办法消除贫困的必要性以及这种办法可能采取的形式，并将发起一轮磋商，以便编制一份路线图，就如何实现这种变革提出建议。必须摒弃增长主义。增长主义造成了不必要的偏离，让我们不关注摆脱低效和浪费的经济安排的迫切要求，也未能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
